



宋祚胤论集

主 编：羊春秋 副主编：游唤民 宋运钊 宋运芳

岳 麓 书 社



宋祚胤论集

主 编：王仲文 副主编：陈仲庚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祚胤论集



主 编：羊春秋

副主编：游唤民 宋运钊 宋运芳

岳 麓 书 社

责任编辑 伍国庆
封面设计 蒋啸镛

宋祚胤论集

羊春秋 主编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河西新民路)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富洲印刷厂印刷

1995年8月第1版 1995年8月第1次印刷

字数:290,000 印张:11.625 印数:1—1000

ISBN7—80520—611—2/B.21

定价:18.00元

湘新登字 007 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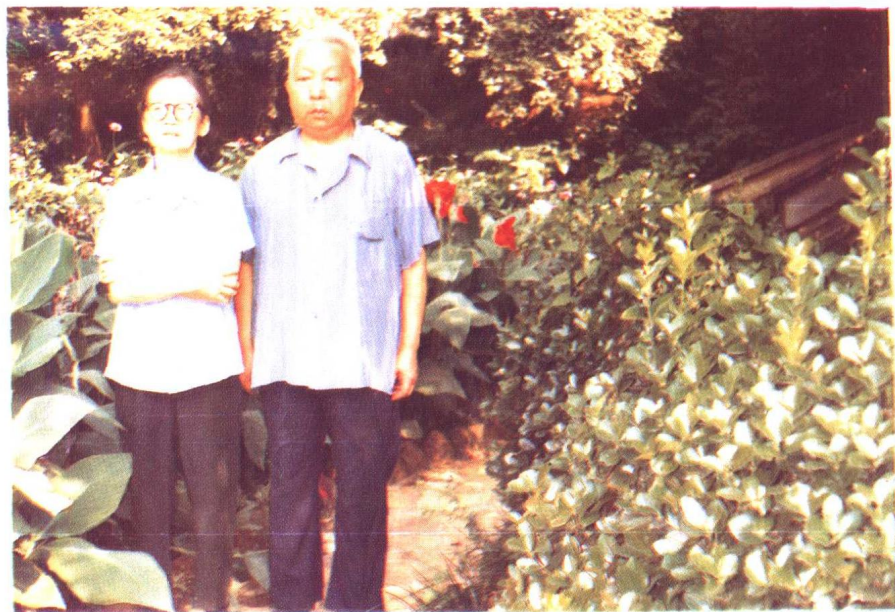


宋祚胤教授，我国著名的周易和先秦哲学研究专家。1918年7月23日生于北京，194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中文系，一直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1994年8月9日逝世。

宋先生先后出版了《周易新论》等五部研究《周易》的专著，建立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周易》研究新体系，还出版了《公孙龙子译注与考辨》等专著，并在国家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学术论文。他的名字先后被收入《国际传记大辞典》，《国际文化名人群星谱》和《国际杰出学术权威指南》。



1984年8月于长沙召开的《宋祚胤先生周易论著研讨会》



宋先生与夫人合影

衷心感谢

太平洋保险公司深圳罗湖支公司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

热忱 赞助

编 委

羊春秋
饶东原
宋运芳
赵振兴
刘周堂
谢圣坤

谭承耕
游唤民
刘坤生
张松辉
徐新平

王大年
宋运钊
许建军
李生龙
刘晓东

前 言

游唤民

宋祚胤教授是湖南花垣县人，1918年生，194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中文系。先后执教于省立八中，吉首民族中学，省立茶洞师范，1956年调入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长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孜孜不倦地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专业知识，在教学上是湖南高校研究生导师的一面旗帜，在科研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成为我国享有盛名的教育家、著名的《周易》和先秦诸子哲学研究专家。宋先生因重病久治不愈，不幸于1994年8月9日辞世。值此宋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我们将宋先生生前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的论文和遗稿，以及他的朋友、弟子为悼念先生所写的文章，汇合成集，以资纪念。

宋先生生前先后出版了六部学术专著，在学术上有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而他的学术论文，更集中了他学术思想的精萃。因此，本论集的出版，无疑可使读者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

宋先生把毕生精力全部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和学术事业。他在治学道路上留下了一个个闪光的足迹——凡他所涉及的领域，几乎都有新的发现。他的《论古汉语主语和谓语之间的“之”字》，纠正了某些名家的错误，在《中国语文》发表后，立即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有的高校据此而修改了自己的教材。他的《论荀况的宇宙观》一文，打破了以往的传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精湛见解，《国内哲学动态》把它列为国内荀学研究的三大派

别之一。他的《公孙龙子译注与考辨》（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出版），以深入浅出的笔调，揭示出了《公孙龙子》的真面目：看来它似乎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其实却都归结为朴素辩证唯物论。这一崭新的结论，突破了以往学术界的陈陈相因之说。

宋祚胤先生在海内外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是对《周易》的研究。他先后出版了五部《周易》研究的专著——《周易新论》（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2 年出版）、《周易译注与考辨》（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出版）、《周易经传异同考》（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年出版）、《易经浅解》（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出版）、《十三经今注今译》（《周易》部分，岳麓书社出版）。以上著作是互相联系的：《周易新论》是纲，《周易译注与考辨》是在《周易新论》的理论指导下，把文字古奥、比喻很多、歧解纷呈、难以卒读的《周易》，逐字逐句译成白话，并分析其意义，还与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李镜池《周易通义》等进行比较，以去伪存真，明其本义，是一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著作；《周易经传异同考》，是对周易经传异同的研究。历来研究《周易》是经传不分，以传为主。其实经传虽有相通，却异多于同，该书对此都一一表而出之，这实为一种创举，对研究《周易》具有重要意义。宋先生在书中特别分析了经传的相异：《系辞》、《说卦》以变爻变卦引《周易》入于占筮，使之沦为迷信；但《系辞》又把《周易》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改造为朴素辩证唯物论，使先秦哲学向正确方向发展。由于《易传》作者并非一人，是得失互见的。这种见解是极其深刻的，发前人所未发；《易经浅解》，浅显通俗，未引古人原文，不作过多分析，只把原文讲得清楚明白，使其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人都能读懂，以利于《周易》的普及；《十三经今注今译（周易部分）》，名为今注今译，其实解决了有关《周易》研究中一系列重大问题，如成书年代、思想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是宋先生多年研究心得的集中体现。

宋先生对《周易》研究，有一个独具特色的新体系，解决了《周易》研究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一、《周易》的成书年代。任何一件事物的出现，都受到环境条件的制约，不首先搞清楚《周易》是在什么时候写的，要读懂《周易》就不可能，因为它是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并无时无刻不在反映这个时代。可是，对于《周易》的写作时代，到目前仍争论不休。这一问题必须得到确切解决，不然对《周易》无从研究。传统的殷周之际说前人已不相信。李镜池先生主西周末年说，值得肯定，但论证无力。宋先生对此作了重新论证，明确地指出《周易》成书于周厉王末年。理由有三：第一，明夷九三有“于南狩”，升卦卦辞有“南征吉”，足证《周易》写作年代至少在周昭王和周穆王以后，因为在二王以前，周代从来没有“南狩”或“南征”。第二，履卦六三有“武人为于大君”，考察西周一代以武人而取代王位的只有共伯和篡夺周厉王王位，见《竹书纪年》。第三，《周易》不涉及“阴阳”，要到周宣王初年虢文公才说：“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因此，《周易》只能写定于厉王末年，不可能延至宣王初年。由于宋先生从《周易》本身找到本证，从而他的《周易》写于周厉王末年的结论，就具有坚实的基础。

二、否定了《周易》为卜筮之书的传统观念，确定了《周易》是一部有完整思想体系的政治书和哲学书。

纠正了把《周易》看成卜筮之书的传统说法。从《周易》开始出现于《左传》，一直到后来，甚至到当代，一般人都把它看成占筮之书。宋先生对其错误作了深刻分析：认为以《周易》为占筮大多数要变卦，例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周史用《周易》为周厉公的小儿子进行占筮，所谓“遇观之否”，这是说观卦变成了否卦。观卦卦象是 , 否卦卦象是 , 观卦变否卦即观卦的六四变成否卦的九四，这是变一个爻而变卦的，还有变几个爻而变卦的。总之，以《周易》为占筮，一般必须变爻变卦，而

《周易》本身绝对不存在从爻的变化而引起卦的变化来预测吉、凶、祸、福的事，所以这在《周易》是毫无根据的，只能是后人的妄加。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的《周易》为卜筮之书的说法。

《周易》首先是一部政治书。《周易》中直接提到王的有 17 卦，提到大人、大君（《周易》中的大人、大君无例外指王）的有 10 卦，提到君子的有 10 卦，其中 5 卦是指王。这样，提到王的就有 32 卦。另外 27 卦，虽未直接提到王、大人、君子，但从内容来看，有许多实际也是写王。宋先生指出，因为《周易》成书于周厉王末年，这里的王当然是指周厉王，这从书中提出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的策略战略思想，更证实了这一点。宋先生这一分析是切中肯綮的。纵览全书，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可说是贯穿着《周易》的全书。例如夬卦（䷪），下乾象征天，上兑象征泽。泽在天上，意味着武人在压抑周厉王。面对着这种情况，周厉王应该怎么办呢？《周易》作者主张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从而对“壮于前趾”（初九）就加以反对，因为脚趾头强壮有力，意味着使用武力，是前进，不是后退，是刚强，不是柔弱。因此，就提出“往不胜，为咎”（同上）的告诫。“壮于頄”（九三）也不行，因为面孔装出凶恶的样子，也违反了柔退之道。这表明《周易》作者希望周厉王专气致柔，老练沉着，去对付武人。履卦反对“夬履”（对武人进行反击），要求“愬愬”（克制忍让），都是《周易》作者要周厉王从忍让中去取得进展。这些均反映了《周易》作者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的思想。最能体现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的是小过卦：“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宜下，不宜上。”小事，指柔弱，大事指刚强。“可小事，不可大事。”就是要柔弱，不要刚强。“下”指“退”和“后”，“上”指“进”和“先”，“宜下，不宜上”，就是要后退，不要领先。在《周易》作者看来，周厉王只有柔弱取后，才能刚强得先，才能“无为无不为”，因为柔弱取后接近于“无为”，“刚强得先”，接近于“无不为”。《周易》作者要周厉王

以退为进和以柔克刚，是为周厉王政治处境决定的。周厉王被放逐到彘，力量微弱，要与正处强大的共伯和硬拼，只能是彻底失败。“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姤九五），就说明以刚强对付武人，即使用心美好，也会祸从天降，一败涂地。所以《周易》作者认为这决不可取，只有以退为进，以柔克刚，才有利于制服武人。可见，《周易》提出的这种策略战略思想，确是为周厉王复国中兴服务的。此外，《周易》作者提出的对武人要两手并用，要采取宽大政策，以及提出的要严明赏罚，求贤相助、重视人民、注意德治、进行改革，无不是为周厉王服务的。所以宋先生提出《周易》是为周厉王复国中兴提供谋略的一部政治书，这是精辟地揭示了《周易》的实质的。

《周易》还是一部哲学书。《周易》的哲学思想体现在“孚”、“中行”、“道”、“无为”以及循环论之中。就以“孚”来看，“孚”在《周易》中出现42次，其中需卦、比卦、小畜卦、大有卦、随卦、观卦、坎卦、大壮卦、晋卦、家人卦、损卦、益卦、升卦、萃卦、夬卦、丰卦、中孚卦、未济卦中的28个孚，都属于主观唯心主义本体。“有孚元吉”（井卦卦辞），这就是说，只要内心有孚，中兴事业就会顺利，行动就会取得很大的成绩。哲学从来是为政治服务的。这除非是说周厉王是有孚之君。“有孚在，道以明”（随九五），“王用享于西山”（上六），由于有孚存在，道就因此而彰明，周厉王就可以像文王、武王那样以复兴的成功去祭告于岐山之神了。这显然是为周厉王打气的。再看《周易》的循环论：泰卦卦辞“小往大来”，是说阴去了阳会来。《周易》把阴叫做小，把阳叫做大。把泰卦与否卦联系起来，那就是阴和阳的循环，是不停止，是无穷无尽的。这种理论用于一个王朝的盛衰，那就是盛了以后就会衰，衰了以后还会盛。乾卦九五“见群龙无首”，就是说出现一群龙，没有为首的，也没有尾随的，就是用来比喻西周王朝的盛和衰将成为循环，“飞龙在天”以后就“亢龙有

悔”，“亢龙有悔”以后就“飞龙在天”。这样一来，厉王衰败了还全兴盛，这是《周易》作者十分盼望的，他写作一部《周易》，目的全在这里。对此，宋先生深刻指出，循环论是为周厉王复国中兴提供理论根据的。

由上可见，宋先生把《周易》认定为是一部完整的政治哲学书，这是极其准确而精辟的，还了《周易》的本来面目。

三、揭示了《周易》是西周哲学过渡到春秋战国哲学的一座桥梁

《周易》中的“孚”，大多数相当于子思、孟轲和荀况的“诚”，这是主观唯心主义本体，它是继承着《尚书》。《尚书·高宗彤日》“天既孚命正厥德”（天已经用诚赋予人们来端正人们的品德），这正是益卦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之所本。一个人只要内心有“孚”，就会大吉大利，这就是坎卦卦辞的“有孚维心，亨，行有尚”。而“孚”如果得到肯定就凡事吉利，这就是随卦九五爻辞的“孚于嘉，吉。”“孚”如果受到损害，就凡事有危险，这就是兑卦九五爻辞的“孚于剥，有厉”。《周易》一切无不围绕着“孚”展开，而孚则从天得来，这是把原始客观唯心主义发展到比较成熟的主观唯心主义，对子思等人有深刻影响。《周易》还由“孚”产生“道”，如随卦九四爻辞的“有孚在，道以明”，这就由主观唯心主义发展到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而为老子所加以发扬光大了。

可见《周易》的“孚”，上通西周客观唯心主义的天，下启儒家的“诚”；《周易》的“道”，下启道家的“道”，这说明《周易》是西周哲学过渡到春秋战国哲学的一座桥梁。向来哲学研究工作都留下了从西周到春秋的空白，而宋先生的《周易》研究却填补了这一空白。

四、提出了研究《周易》的正确方法。宋先生在《周易》研究中，否定了历来对《周易》的几种错误的研究方法：

一是占筮说：用占筮研究《周易》的错误，已如上述。

二是爻位说：《易大传》的爻位说，把一个卦的六个爻分为奇数的位次和偶数的位次，初、三、五是奇次，二、四、六是偶次，阳爻居於奇次，阴爻居于偶次，都是得位而吉，反过来都是失位而凶。这也与《周易》本身不合。例如既济（䷾），上六是阴爻，应是得位而吉，可是其爻辞却是“濡其首，厉。”这是凶而不是吉。对此，宋先生指出：“把一卦分为奇次和偶次，以阳爻在奇次，阴爻在偶次为得位而吉，反之就是失位而凶，经不起《周易》的检验，从而爻位说不能成立。”

三是“灵签符咒”说，把卦爻辞视为“灵签符咒”一盘散沙。宋先生指出：把《周易》的卦爻辞看成各自独立，互不相干，这也与《周易》本身不相符合。

宋先生认为上述研究方法都不能得到《周易》的本真，是错误的。正确的研究方法是：应把《周易》作为一个整体，每卦又各具首尾，先分析卦象以为一卦立纲定向，再结合卦辞对一卦的大意进行概括，并以六条爻辞进一步加以说明。此外，还得分清内外卦哪是主卦，哪是辅卦；一个基本卦的三爻，哪一个爻是主爻，哪两爻是辅爻；而对比喻的正确理解，也是读懂《周易》的一个关键。总之，要从《周易》本身来研究《周易》，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研究方法。

宋先生研究《周易》的新成果，已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中国出版年鉴》（1983年）云：“《周易新论》则是立众说之外，独树一帜，自成新论。作者在书中一扫数千年来的传统观点，首先探讨了《周易》的写作年代和研究方法，进而论述了《周易》的宇宙观和政治观。他认为：《周易》不是卜筮之书，而是一部具有完整思想体系的著作。”《中国书信》（1984年18期）以英文版将《周易新论》向海外介绍，云：“自古至今，解释《周易》的著作不下三千余种，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周易新论》

的作者在对这部古籍的研究中，发展了自己的新学派。”《周内哲学动态》（1984年1期）云：“《新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指导易学研究，从卦象、卦爻辞的总体联系上把握《周易》的性质，论定《周易》非卜筮之书”，“力排旧学，自成一家之言，为恢复《周易》的本来面貌作了开创性的工作。”《国际传记中心》（英国剑桥主编）将宋先生收入《国际传记大词典》，北京大学编写的《简明易学知识大辞典》及吉林大学编写的《周易辞典》均将《周易新论》及作者作为一条目收入该辞典。蔡尚思教授主编的《周易大辞典》编委会称宋先生“是国内著名哲学家”，并将他聘为该编委会顾问。

宋祚胤先生之所以在学术上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首先是与他的学问根柢分不开的。他长期从事先秦文学和古汉语教学，对古籍烂熟于心。他上课前，尽管写了详细讲稿，但上课时从不看讲稿。讲课中对引用的古籍的原文，可以脱口而出，一字不差的讲出来。他给弟子审定论文稿件时，不查原文就能改正其引文中的错误。可见宋先生对古籍特别是对先秦古籍熟悉的程度。“根深才能叶茂”，正因为宋先生学问根柢厚，功夫深，为他的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更是得力于马克思主义。宋先生曾下过一番苦功夫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写下了数十万字的读书笔记。正如他自己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给了我慧眼。”正由于他能纯熟自如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所以他思想极为敏锐，往往别人看不到的问题，他能看到；别人难以发现的问题，他能发现。因而他的研究，能不断创新，不断有新的发现，不断地出新的重大成果。

总之，深厚的学问功柢加马克思主义是他在学术领域内能取得突破性的重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宋祚胤先生辞世将近一周年了，他的学术成果，并不会随着他的去世而消逝。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更加显示出它的

光辉。

本论集的出版，得到了作为全国十五家优秀出版社之一的岳麓书社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致以深深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